

经济
科学
译
库

English Historical
Economics:
1870-1926

英国

英国历史
经济学：

1870—1926

经济史学科的兴起与新重商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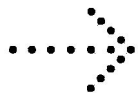
杰拉德·M·库特

Gerard M.Koot

乔吉燕

/译

/著



经济科学译库

英国历史 经济学： 1870—1926

经济史学科的兴起与新重商主义

杰拉德·M·库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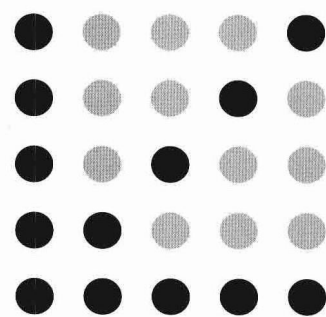
Gerard M. Koot

乔吉燕

/译

/著

English Historical
Economics:
1870-192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经济史学科的兴起与新重商主义/库特著；乔吉燕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经济科学译库)
ISBN 978-7-300-11926-7

- I. ①英…
II. ①库…②乔…
III. ①经济思想史-研究-英国-1870—1926
IV. ①F09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6607 号

经济科学译库

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经济史学科的兴起与新重商主义

杰拉德·M·库特 著

乔吉燕 译

Yingguo Lishi Jingjixue: 1870—1926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85mm×260mm 16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17.5 插页 2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24 000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译本前言

本书汇集了我对英国历史经济学以及经济史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在英国兴起经过的研究成果。得知中译本即将出版，我非常高兴。第一次接触到英国历史经济学的概念，是在阅读伯纳德·塞穆尔的开创性著作《帝国主义与社会改革》时，当时我正在撰写本科毕业论文，论题是英国帝国主义史。到我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时，他鼓励我在阅读历史学家的著作之外也阅读经济学家的著作。就这样，在伯纳德·塞穆尔教授指导下，这项研究的核心部分便作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启动了。不久，我成为东南马萨诸塞大学的一名年轻教员，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继续抽时间开展这项研究。后来，在英美两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均有较大影响力的 A. W. 科茨教授鼓励我多加关注思想史的制度背景。结果，我又在英国和美国的档案馆里花费大量精力，利用档案资料来研究经济思想史。遗憾的是，塞穆尔教授和科茨教授近年均已过世，不过，他们的学术遗产仍留在他们公开发表的作品里，也留在他们学生的研究里。

这项研究的一个主题是经济史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在英国兴起的经过。因此，本书写到 1926 年经济史学会 (Economic History Society) 的成立即收笔。但是，正如我后来在一篇关于 1920—1950 年英国经济史学史的文章（刊于 1993 年的《政治经济学史》杂志）中所讲，历史经济学的一些主要关注点仍然具有根本重要性，事实上，这些关注点直到今天还十分重要。从广泛的意义上讲，英国历史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思想必须是相对于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而言的，经济思想必须始终是政治经济学。

本书初稿完成于 1987 年，自那以后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让很多人再次认为，正确的经济思想框架只有一个，组织全球经济的方式也只有一个。而在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期间，当英国的繁荣与强权如日中天时，这个国家亦曾有许多人把古典经济学及其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当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亚洲经济体



的兴起，尤其是中国经济非比寻常的增长，以及最近的世界金融危机，再次让我们想起英国历史经济家的核心论点：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无论其表达方式多么完善，都只适用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因此，尽管自本书初次问世以来涌现了大量有关英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成果，我认为本书所讲的故事大体上仍是正确的，它所阐述的核心主题，即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具有相对性，有助于向新一代经济思想家和政策制定者发出警示：我们必须基于自己所处时代新出现的国内及全球实际情况，提出新的经济思想，制定新的经济政策。

杰拉德·M·库特

麻省大学达特茅斯校区历史系

2010年2月



致 谢

这项研究能够完成，离不开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伯纳德·塞穆尔（Bernard Semmel）教授和诺丁汉大学 A. W. 科茨（A. W. Coats）教授的鼓励和建议。塞穆尔教授最先向我提出这个课题，并对我的经济思想史研究给予鼓励。本研究的思想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英国思想史和社会史的深刻见解。科茨教授则鼓励我多加关注历史经济学家擅长研究的制度框架。两位教授均读过我的几份手稿，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并指出了多处错误。没有他们的建议和关心，这项研究不可能完成。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纽约大学伊丽莎白·德宾（Elizabeth Durbin）教授，她对手稿认真仔细的检查增强了本书论点的论证。

同样，我要感谢那些善意的批评家，尤其是大西洋两岸及澳大利亚经济思想史协会的会员，他们帮我清晰阐述了我自己的观点。我还要特别感谢拉夫堡大学（Loughborough University）的保罗·斯德基斯（Paul Sturgis）先生，在我刚开始这项研究时，他向我提供了手稿资料。我在东南马萨诸塞大学历史系的同事詹姆斯·希吉亚（James Hijiya）教授在文风方面给予我大力帮助。我还要感谢美国和英国的档案管理员和图书管理员，他们不仅允许我使用他们管理的资料，还提醒我关注一些新的方向。在此，我要特别感谢英国政治与经济学图书馆、哈佛大学克雷斯商业与经济学图书馆、剑桥大学马歇尔图书馆以及其他多家图书馆的管理员，在他们的允许下，我才得以使用本书参考文献中列出的手稿资料。

本书几版草稿由东南马萨诸塞大学切里尔·菲利普斯（Cheryl Phillips）女士和朱迪·维佳（Judy Veiga）女士打印。她们以很高的效率耐心地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哈佛大学克雷斯商业与经济文库、国家人文基金以及东南马萨诸塞大学等机构对这个项目的各个部分分别给予了资助。

最后，我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家庭。我的父母为我作出了很大牺



牲，并激励我进入大学深造，此书献给他们。我的妻子夏拉（Sheila）用她对我的信心、支持和爱鼓励我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我的儿子迈克尔（Michael）和克里斯汀（Christian）懵懂地关注着这项研究的进展，并享受研究过程中旅行的快乐。

马萨诸塞州北达特茅斯
东南马萨诸塞大学*
杰拉德·M·库特
1987年8月



* 现名麻省大学达特茅斯校区。——译者注

目 录

导言	1
第 1 章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危机与 重建努力, 1870—1885	10
第 2 章 外国人、先驱者及爱尔兰人 对历史经济学的贡献	36
第 3 章 统计学、历史经济学与经济史	70
第 4 章 历史经济学在牛津大学	96
第 5 章 W.J. 阿什利: 英国社会主义教授与资本主义的发展	116
第 6 章 历史经济学在马歇尔的剑桥: H. S. 福克斯威尔与资本主义的 无规律性	139
第 7 章 经济史与新重商主义: 威廉·坎宁安和 J. S. 尼科尔森	156
第 8 章 W. A. S. 休因斯与韦伯夫妇: 应用经济学、经济史与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185
第 9 章 结论与后记	216
主要参考文献	241
索引	253
译后记	270



导 言

1 1926年，经济史学会（Economic History Society）第一任会长威廉·詹姆斯·阿什利（William James Ashley，英国历史经济学家的最早代表）告诫经济史学家：“理论经济学家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给我们一小块田地，我们便会无话可说；而我们这些谦卑的历史学家，则为能够得到这块没有争议的领土感激涕零，以至听任经济学家自行其是。”^[1]阿什利的话精准地道出了经济学、经济史和历史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在说此番话之前50多年，阿什利便着手推动经济史研究，并努力促成用建立在归纳研究基础上的新出现的历史经济学来取代演绎性的经济理论。阿什利并不赞同把经济研究划分为经济理论、应用经济学和经济史三块。^[2]在本文中，“经济史”这一术语用来描述有关过去经济现象的研究，也就是说，它主要用来描述一类历史。“应用经济学”在本文主要是指出于政策制定的目的而进行的当代经济问题研究。而“经济理论”则用来描述从经济现象中推导出的抽象原理。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大学开始把经济理论和经济史当作两门相关但却互相独立的学科对待。不过，在这两门学科的分化反映到大学考试中之前，历史经济学家已经开始了他们的学术生涯。他们同时从事经济理论、应用经济学和经济史的教学与研究。但是，主要重心还是放在经济史和应用经济学上。

2 在英国历史经济学家中，除阿什利是个特例以外，其他人都没有像知名度更高的德国历史学派那样，力图在归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起系统的历史主义经济学，也就是说，从归纳性的历史研究中推导出一般规律，进而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理论体系。相反，英国历史经济学家只是希望提醒经济理论家以及广大公众，理论是有局限的。他们希望推动有关经济史和应用经济学的归纳性研究，以此来促进社会改革。此外，尽管英国历史经济学家的研究计划大致相同，其中均包含目的论和进化论的历史观，但他们的研究兴趣和个人情况却迥异，这使他们无法在英国创立一个像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或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经济科学译库 / 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



(Alfred Marshall) 的新古典经济学派那样的历史经济学“学派”。^[3]正如 A. W. 科茨所言，英国历史经济学主要是从历史角度来批判英国正统的政治经济学。简言之，英国历史经济学更多的是历史主义的批判，而不是力图建立一个新经济理论体系的历史主义的努力。^[4]

19 世纪 70 年代，处于支配地位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学派在方法上主要用的仍是演绎法，而理论结构则是继续沿用李嘉图的。这一学派在知识界的威望不仅缘于其严密的理论结构，还因为在 19 世纪上半期英国崛起为工业霸主的过程中，古典经济学被人们视作信条，这给予了它极高的荣誉。然而，随着德国统一、美国从内战中恢复，特别是，从 1873 年到 1886 年，英国的经济增长和技术革新步伐放缓，古典经济学开出的包含自由贸易、从理论上反对工人联合和笃信自由竞争这三种成分的处方面临日益严峻的考验。与此同时，历史经济学家和边际革命参与者对他们提出了理论批判，质疑其方法论、价值论、分配方案以及隐含的完全竞争和市场万能假设。相对来说，历史经济学家在实现其第一个目标，即摧毁旧体系方面，远比在建立新体系这第二个目标上要成功得多。后一项任务最终是由新古典经济学家完成的。他们不仅直接参与了摧毁旧理论的过程，还在杰文斯 (Jevons) 和马歇尔的先后带领下，在英国创立了一门新的正统学说。在本质上，新古典经济学用的仍是演绎法——尽管为历史批判所调和，因为它将自己的理论结构重建在更为牢固的边际效用分析基础之上。并且，相比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在论断科学与应用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时要谨慎得多。

3 尽管英国历史经济学家未能成为英国的一个主要经济学学派，更不用说占主导地位了，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断言，他们在经济思想史或是在整个历史中毫无意义或微不足道。即便是在历史的辉格 (Whiggish) 解释盛行的经济思想史领域，历史经济学家的重要性也得到认可。总体来看，他们主要的历史意义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他们促进了英国古典经济学自负、褊狭甚至是独断专行作风的终结。他们不断地提醒新古典经济学家，他们的结论是具有假设性的，需要进行实证研究，并且，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只适用于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其次，在经济政策的制定方面，历史经济学家通常强调要着眼于全国、甚至是整个帝国，来制定经济政策和推行社会改革，这已成为 20 世纪的一个显著特征。再次，在经济史发展成为一个公认的研究领域的过程中，这些历史经济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他们最为具体也最为持久的影响。

1926 年经济史学会的成立表明，经济史这门学术科目已经取得了专业地位。此时，大学考试中已经纳入经济史这门学科，大学中也开始设立相应的职位，专业的经济史学家出版的经济史类著作日益增多，公众对这门学科的认知度也越来越高，这些都是经济史构成一门公认

学科的证据。^[5] 尽管创办经济史学会的动力来自历史学家,^[6] 但是, 在 19 世纪的最后 25 年里, 历史经济学家对学会的成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为经济史这门新兴学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在经济史成为英国一门公认的学科以前, 有关这一领域的历史册 (historical tracts)、专著、论文和小册子等早已有之, 主题多种多样。^[7] 不过, 19 世纪末期与之前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 这一时期, 有关经济史的主题在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教学与学术论著中所处的地位日益突出, 同时, 把这些论著及其所反映的潜在利益连贯起来的知识框架和社会框架也应运而生。这些因素既有积极的方面, 也有消极的方面。消极的方面主要是指, 它们对早已确立的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和原理以及整个功利主义社会理论构成了攻击。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反映的是 19 世纪上半期流行的个人主义和世界大同主义的社会理想。然而, 到了 19 世纪下半期, 相对于来自 18 世纪的相对机械主义的概念, 人们在社会思想上更加推崇进化论的、历史主义的和集体主义的概念模式。^[8] 积极的方面包括: 在 19 世纪后半期, 产生了“科学”的历史方法, 尤其是在历史和法律研究这两个领域;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引入了历史考试; 历史的经济方面日益受到关注;^[9] 学者呼吁建立总体的社会科学; 以及公众日益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现实问题。伴随这些现象且与消极面相关的是, 一些人日益强烈地感觉到, 当时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观念, 无论怎么调整都基本无法与当时的情况相适应, 并且, 这些经济学观念还与那些令人厌恶的政策和观点有关联。历史经济学家断言, 与古典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经济理论相比较, 经济史和应用经济学的研究更适合用来指导公共政策制定。

历史经济学家的社会理想和政策建议与正统学派截然不同。历史经济学家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之间的冲突不能被解释成是对德国方法论之争 (Methodenstreit) (以卡尔·门格尔 (Carl Menger) 为首的奥地利演绎经济理论家和以盖斯塔夫·施穆勒 (Gustav Schmoller) 为首的德国归纳历史学派之间的一次著名的方法论论战) 的苍白反映。英国方法论之争则涉及: 经济研究中归纳法或演绎法的正确运用, 科学家在社会中的作用, 大学里针对学术职位和研究领域的竞争, 以及基本不相同的社会和政治理想, 最后这一点也许是最为重要的。从整体来看, 英国历史经济学家的著作可被归入新重商主义一类。他们不仅坚持认为, 重商主义者更具归纳性、更切合实际的方法要优于古典经济学家的抽象术语, 还认为, 重商主义者的民族主义考量, 他们认为企业应为公众福利承担责任的信念以及其国家监管体系的某些方面, 比他们所称的自由竞争制度更为可取。除了在著作中反映这些理想以外, 历史经济学家还以不同的方式推动开展一些公益事业, 如支持爱尔兰社会改革, 推进工农业工人状况改进, 促使工会获得承认以及关税改革等。作为历史经济学家, 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政治主张与



经济科学译库 / 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

4

学术活动有冲突；事实上，这类活动恰恰表达出了他们所追求目标的精髓。

5 历史经济学家——特别是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W. J. 阿什利、H. S. 福克斯威尔（H. S. Foxwell）、威廉·坎宁安（William Cunningham）和 W. A. S. 休因斯（W. A. S. Hewins）——希望在社会主义与没有任何监管的资本主义之间找到一个折中点。尽管在政治倾向上，他们从自由党转向了工党和保守党，但是，就像他们之后的 J. M. 凯恩斯（J. M. Keynes）一样，他们希望能够操控资本主义。他们的方案可以被称作“社团主义”（corporatist），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社会—帝国主义”（social-imperialist）。不过，用“新重商主义者”（neomercantilist）这个词来称呼他们似乎要更为准确一些，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历史经济学家恢复了英国的重商主义历史。第二，他们自己不断重复这一主张：重商主义经济学无论多么不完善，它至少是寻求解决当前紧迫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第三，他们认为，相比强调个人和企业福利的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社会福利的重商主义其思想框架和道德框架要更好。第四，虽然正统经济学除了以其广为人知的教条形式以外，从未专门支持过自由竞争或自由贸易，但历史经济学家却在 1870 年到 1914 年间对这种理想进行了正面攻击。最后，“新重商主义”一词正是为英国历史经济学量身打造出来的。

在本书中，“新重商主义”一词用的是它最广义上的含义，与 L. L. 普赖斯（L. L. Price）1902 年在一篇关于关税改革的文章中所阐述的一样。普赖斯认为，一股爱国主义思潮正在席卷全球：“公正的观察家会认为，相对而言，这种爱国主义思潮与重商主义而不是自由贸易体系的理念更加一致。”尽管有许多限制条件，普赖斯仍断言：“自由贸易是‘世界主义的’，贸易保护是‘民族主义的’。”^[10]正如大量有关英国重商主义的文献所显示的那样，重商主义者既希望增强国力，又希望实现经济繁荣。这种传统正是大多数英国历史经济学家希望经过调整与 20 世纪相适应的。1924 年凯恩斯发表的关于自由竞争终结的著名宣言，以及他在 1930 年发出的更具轰动性的对国家自给自足的呼吁，经常被看作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预言。但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一点一点蚕食掉自由贸易的政客、商人和公务员，当时并没有听凯恩斯的。相反，他们可以在英国历史经济学家的学术论著和公开声明中，为他们的保护主义和干涉主义方案寻求辩护，如果用学术知识进行的辩护有用的话。

英国古典经济学转型与历史经济学兴起的时期，正是英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历史学家通常把 19 世纪 80 年代看成是英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11]对当时的人来说，英国经济史的核心事实就是他们所称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现在，

我们知道, 1873 年到 1896 年这段时期并不是萧条期, 而是英国工业增长减速的开端。对当时的人来说, 这段时期的经济问题对人们造成了致命的心理打击, 以至于到 20 世纪, 维多利亚时代对英国作为世界工厂和和平主宰的自信几乎荡然无存。

不过, 这一时期农业确实出现了衰退。从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期, 地租下降了四分之一。1846 年废除《谷物法》并未立即威胁到英国农业, 但自 1870 年以后, 随着欧洲和美洲实现和平与繁荣, 新农业技术得到采用, 海洋运输价格下降, 洲际铁路修建, 以及北美和俄罗斯的荒地生产出低价粮食, 英国的耕种农业难以继续保持繁荣。相比之下, 与城镇紧密相连的商品园艺和乳品业情况要好得多。这些因素与土地问题, 特别是爱尔兰的土地问题交织在一起, 使人们对自耕农、地租的性质、农业发展与国家繁荣之间的关联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英国耕种农业所存在的问题还导致农村居民在英国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均出现绝对下降。^[12]

这一时期, 工商业并没有出现全面萧条。然而, 物价下跌、利润下降以及来自外国的竞争导致了一场严重的信心危机。对当时的人来说, 对外国竞争的恐惧尤为严重, 这种恐惧在 19 世纪 80 年代早期兴起公平贸易运动和 1903 年约瑟夫·张伯伦 (Joseph Chamberlain) 发起更为激烈的关税改革运动时达到顶点。早已习惯了世界最大工业品出口商这一地位的英国, 现在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都受到工业强国德意志帝国的严重挑战。在制铁业、造船业、机具业、甚至是纺织业等各个主要商品行业, 由于生产率低下, 技术革新缓慢, 家族式管理尚存以及教育与产业脱节等一系列因素, 英国的地位有所下降。在一些较新的产业, 如钢铁业、化工品业以及后来的电力业等, 发展迟缓也很明显。当然, 经济中也不乏亮点, 在零售业、食品加工业、家用产品业、服装业、制药业等行业尤其如此。到 19 世纪晚期, 英国企业的规模有所扩大, 出现了大型集团公司。事实上, 在世界最大企业排行榜上, 英国企业的数量和美国不相上下。但总体来说, 与美国相比, 英国的家族企业更为普遍。到 19 世纪 90 年代, 英国的经济学家日益感到, 有必要着手在英国开展有关现代商业的教育。与此形成对照的是, 无形收入出现增长, 这无疑是经济中的一个亮点。从 1873 年到 1896 年, 来自贸易与金融服务、投资和保险的收入占英国进口成本的比例从 12% 升至 24%。因此, 这种现象导致了一场重要的论战, 论战一方认为这种现象显示了自由贸易的明智, 而另一方则认为这恰恰是自由贸易的主要罪恶。^[13]

19 世纪最后 25 年里, 由于工资水平相对稳定, 而物价却有所下跌, 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尽管与 19 世纪大部分时间的平均增长率相比, 总的人口增长率并没有明显下降, 但是, 随着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马尔萨斯人口论所引起的恐惧似乎已经烟消云散。



经济科学译库 / 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



6

实际上，从19世纪70年代起，中产阶级的人口出生率已有明显下降。人们预计，这种趋势会与中产阶级的道德观一起向下渗透到较低阶层。然而，尽管总体局面比较乐观，但是，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由各种因素所导致的要求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呼声却日益高涨。在这些因素中，首要的就是1879年、1886年和1893年爆发的三次严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危机导致工作不稳定性相对19世纪50年代大大增加。19世纪80年代，查尔斯·布思（Charles Booth）对伦敦进行的著名调查显示，至少有30%以上的伦敦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而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工作不稳定。实际上，工会在1871年就取得了合法地位。到了19世纪80年代晚期，又出现了“新工会主义”。这项运动把整个产业界与部分不熟练工人卷入了一场工人运动，之前几十年的同业公会时期基本不存在的交战状态重又出现。现在的问题已不是工会的成本与收益，而是如何处理工人提出的权力共享要求。^[14]

在政治与社会理论方面，19世纪80年代在英国历史上是个分水岭。1867年的《改革法案》并没有真正给英国带来民主，不过，当时的人认为它最终会促进民主的实现，这种看法也没有太大偏差。随着1884年《改革法案》以及确保选举公开公正的无记名投票法和一系列反贪污法的实施，英国几乎实现了男性普选权。在政治上，这些新进展促生了带有全体选民选举组织的现代政党，推动了工人候选人的出现。此外，随着迅速扩大的中产阶级中一些有抱负者跻身政府部门，政府中的贵族统治也有所减弱。事实上，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已经开始具备典型的20世纪阶级结构，中产阶级最终实现实质性的权力共享，在官僚机构和专业性行业中尤其如此。

8

我们现在知道，自由竞争在英国确立的时期，也是可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的新国家干预体制逐渐建立的时期。但是，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公共支出规模大幅增加，国家调控力度也大大增强。特别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如1870年的行政与教育法，1875年的工会法，1880年的雇主责任法，1884年的疾病预防法和邮政法，1881年的土地法，1890年的住宅法等。这些法规以及其他许多法规的出台大大增强了国家的权威。通常，立法之前会设立各种皇家委员会，如1881年的皇家农业委员会，1886年的皇家贸易萧条治理委员会，19世纪90年代的皇家劳工、济贫及货币委员会等。最后，从19世纪70年代起，英国的大城市开始建立“城市社会主义”体系，包括市政当局拥有运输与公共设施，监管商业行为，并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当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理论家还在把所有这些当作自由竞争的特例进行讨论时，这些“特例”的数量已经十分巨大，以至于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国家干预体制了。^[15]

1870年以后，对宗教的信仰迅速被对科学的信仰所取代。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尽管广义上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和主要派生自宗教

的目的论式历史观对几位英国历史经济学家的工作产生了显著影响，然而，在这一时期的许多社会理论家中，宗教热情正在被对各种社会科学的虔诚信仰所取代。社会理论，无论是孔德实证主义、斯宾塞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唯心主义，还是这几种理论的融合，在其表述上都是历史主义的。19 世纪 60 年代，进化式社会理论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取代较早时期相对静止的功利主义成为正统信条。与此同时，19 世纪晚期还出现了各门社会科学的专业化及随后的专门化。到 20 世纪早期，各门社会科学开始在其各自所属的大学院系中站稳脚跟。思想和社会方面的上述变化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学论战产生了重要影响。^[16]

- 9 在政治领域，这一时期，所谓的“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其理论和现实均已出现。这种理论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孤立的个体既无法享受物质福利，也得不到真正的自由。因此，国家的职能是积极推动形成有助实现个人福利与自由的社会基础。传统自由主义所提倡的消极自由，对于治理拥有 800 万平方英里疆土、2.65 亿人口的帝国来说已力不从心，治理这个面临工会、大型集团公司、民主、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和严峻的外国竞争的岛国也难以胜任。新自由主义理论与 T. H. 格林（T. H. Green）在 19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观点有密切关联；不过，早在一代人以前，这种理论就出现在 J. S. 穆勒（J. S. Mill）的著作中了。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并没有轻而易举就照搬到政治实践中。19 世纪 80 年代，不仅自由党内部产生了新激进主义，还出现了众多社会主义组织和新社会保守运动。帝国主义仅仅是复杂的新增问题中的一个而已，尽管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阿什利、休因斯和坎宁安等历史经济学家是社会帝国主义阵营的中坚力量，这个阵营超越了各种旧的政党，主导着 20 世纪早期的政坛。^[17]因此，19 世纪最后 30 多年里经济学界的论战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因为其中许多关键问题反映了这一时期基本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潮流。我们要理解旧政治经济学的危机和围绕其重建引发的争论，就必须着眼于这个宏观背景。

注释

[1] 参见 William James Ashley, “The Place of Economic History in University Studi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 (January 1927), 4.

[2] 杰文斯在 19 世纪 70 年代已经指出这种划分。参见 W. Stanley Jevons,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5th ed., New York, 1954), XV~XXVII.

经济科学译库 / 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

8

[3] 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在构成一个致力于为明确的学术计划而奋斗的科学团体这个意义上”，历史经济学家未能形成一个学派，参见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1954), 822。关于学派与分支学科，参见 Joseph V. Remenyi, “Core Demi-core Interaction: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Disciplinary and Subdisciplinary Growth”,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1 (Spring 1979), 30~63。

[4] 参见 A. W. Coats, “The History Reaction in English Political Economy, 1870—1890”, *Economica*, N. S., 21 (May 1954), 143~153。还可参见 H. S. Foxwell, “The Economic Movement in England”,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II (October 1887), 84~103; A. W. Coats, “Sociological Aspects of British Economic Though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5 (October 1967), 706~729; John Maloney, Marshall, *Orthodoxy &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Economics* (Cambridge, 1985); Alon Kadish, *The Oxford Economist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1982)。

[5] 第一个全职的经济史讲师职位 1904 年在伦敦大学设立，第二个 1905 年在曼彻斯特设立，第三个 1907 年在牛津设立，第四个 1908 年在爱丁堡设立，第五个 1910 年在贝尔法斯特设立。英国第一个经济史教授职位 1910 年在曼彻斯特设立，第二个 1921 年在伦敦设立。剑桥和牛津直到 1928 年和 1931 年才分别设立经济史教授职位。参见 N. B. Harte, “Introduction”, *The Study of Economic History: Collected Inaugural Lectures, 1893—1970* (London, 1971); N. S. B. Gras,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Histo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 (June 1927—1928), 12~34; Sir Frederic Rees, “Some Trends in Economic History”, *History*, XXXIV (1949), 1~14。

[6] 伊弗雷姆·李普森和 R. H. 托尼为经济史学会的成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参见 T. C. Barker, “The Beginnings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Society”,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XXX (February 1977), 12。

[7] 参见哈佛大学克雷斯商业与经济学图书馆的主题索引等。

[8] 参见 J. W. Burrows, *Evolution and Society: A Study in Victorian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1966); Reba N. Soffer, *Ethics and Society in England: The Revolu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1870—1914* (Berkeley, 1978)。

[9] 参见 J. W. Burrow, *A Liberal Descent: Victorian Historians and the English Past* (Cambridge, 1981); 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oston, 1959); MVD. Knowles, “Some Trends in Scholarship, 1868—1968, in the Field of Medieval

History",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th Series, 19 (1969), 139~158; Herbert Butterfield, "Some Trends in Scholarship, 1868—1968, in the Field of Modern History",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th Series, 19 (1969), 159~184.

[10] 参见 LVL. Price, "Free Trade and Protection", *Economic Journal*, 12 (September, 1902), 314。在 "Mercantilism: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he Manchester School*, 42 (March 1974), 1~17) 一文中, 哈里·C·约翰逊 (Harry CV Johnson) 也用了这个词的广义含义。

[11] 古典经济学的危机发生于 19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 参见 T. W. Hutchison, *On Revolutions and Progress in Economic Knowledge* (Cambridge, 1978)。

[12] 参见 F. M. L. Thompson, *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ronto, 1963)。

[13] 参见 Derek H. Aldcroft and Harry W. Richardson, *The British Economy, 1870—1939* (London, 1969); Phyllis Deane and W. A. 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Cambridge, 1969); H. J. Habakkuk, *American and British Technolog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1962); A. L. Levine, *Industrial Retardation in Britain, 1880—1914* (New York, 1967); Benjamin H. Brown, *The Tariff Reform Movement in Great Britain, 1881—1895* (New York, 1943)。

[14] 参见 Henry Pelling, *Origins of the Labour Party*, (2nd ed., Oxford, 1965)。

[15] 参见 Peter Stansky ed., *The Victorian Revolutio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Britain* (New York, 1973)。

[16] 参见 Helen Lynd, *England in the Eighteen-Eighties: Toward a Social Basis for Freedom* (London, 1945); Albion Small, *The Origins of Sociology* (Chicago, 1924); Melvin Richter, *The Politics of Conscience: T. H. Green and His Ag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64)。

[17] 参见 Michael Freedan, *The New Liberalism: An Ideology of Social Reform* (Oxford, 1978); Bernard Semmel, *Imperialism and Social Reform: English Social-Imperial Thought, 1885—1914* (London, 1960); Robert J. Scally, *The Origin of the Lloyd George Coalition: The Politics of Social-Imperialism, 1900—1918* (Princeton, 1978); G. R. Searle, *The Quest for National Efficiency: A Study in British Politics and British Political Thought, 1899—1914* (Berkeley, 1971)。